

牢记“三个务必” 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编者按·

■ 刘爱章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标注了中国共产党前瞻性思考、规律性把握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新高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标注了中国共产党前瞻性思考、规律性把握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新高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强调“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这里浸透着党的领袖对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汲取，彰显着党的领袖的战略眼光。党的十九大报告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新时代话语，并非只适用于新时代，而是贯通党的历史全程，“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即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容；其贯穿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例如关于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天下穷苦人民谋幸福”是我们的初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深刻认识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其对党员个体、政党整体都具有长期适用性，对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具有观念引领性，对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价值。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全党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范例，这一新时代话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中共党史内容、理论衍生特质、实践拓展空间、政党基因结构、情感唤起功能，对于全党同志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昂扬的精神气象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具有强大感召力。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出“两个务必”，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在全国范围执政面临的风险考验有着“赶考”的高度清醒。

70多年后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首次提出的“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坚持和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两个务必”的时代精华，不骄不躁之意蕴含其中，而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得出的更新结论，是应对新征程上新任务新挑战提出的更高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继承和弘扬“两个务必”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上毫不含糊，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一以贯之。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一场“接力赛”，前承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基业，后启社会主义更高阶段之伟业，在内容上这是一次新的“赶考”、

新的“长征”。面对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复杂严峻国际环境，面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上的艰巨繁重的国内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走好新的赶考路、长征路，持续保有奋斗成果、继续创造人间奇迹，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丢不得，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缺不得，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思想要不得，停在半山腰歇歇脚松口气的想法来不得。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斗争具有客观性，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鸵鸟心态”只会贻误战机，结果贻害无穷。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党同志要切实懂得为了谁而斗争、向着什么目标而斗争；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全党同志要切实明白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投身斗争，与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怎样赢得斗争胜利等基本问题一起，共同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斗争理论体系。简而言之，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要通过斗争才能获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才能赢得斗争胜利。

党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所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始终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斗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往而不胜。

敢于斗争才能赢得胜利。百年来的奋斗历史充分说明，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在百年征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豪情、“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赢得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件大事”的历史性胜利，“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伟大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敢于斗争，敢字当头，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敢于斗争要求善于斗争。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既要敢于斗争、斗志充盈，也要善于斗争、本领高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进一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对于练就高强斗争本领，具有高屋建瓴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此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坚持”历史经验，对于提高斗争能力和水平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出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切实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引领全党同志在斗争中学习练就 and 不断提高斗争本领，以胜利实现党确定的目标任务。

中国社会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正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我们还将继续前进。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党所肩负的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须牢记“三个务必”，一体化理解，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度的历史自觉置身事内，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图志 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陈茹玉：

中国有机农药研究开拓者



▲ 1957年，陈茹玉（左）与学生在资料室查文献。



◀ 陈茹玉

陈茹玉（1919—2012），福建省闽侯县人，我国著名有机合成化学家、合成农药化学家、教育家。她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中国在农药生产中的空白，也缓解了中国长期依赖农药进口的局面。

1919年9月24日，陈茹玉出生于福建省著名的侨乡闽侯县。6岁时，她跟随父母举家迁往天津，进入天津圣功学堂就读。1931年，陈茹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天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1937年，陈茹玉高中毕业。不久后卢沟桥事变爆发，陈茹玉目睹日寇侵华的残暴，国难当头的愤怒促使她渴望运用自己所学参与抗日救国。1938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陈茹玉千里迢迢前往昆明报考国立西南联大。喜爱数学的陈茹玉想报考数学系，但老师建议她报考当时国家急需人才的化工专业，由此陈茹玉开启了她追求一生的化学科研之路。

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陈茹玉遇到了终生相随的伴侣何炳林，1942年，两人顺利毕业。1946年，陈茹玉返回天津，任教南开大学化学系。1948年，陈茹玉和何炳林考取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赴美留学；半年后，在杨石先教授的推荐下，二人一同转入印第安纳大学化学系深造。1952年，陈茹玉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中美关系紧张，陈茹玉的回国申请多次被拒，辗转多年，夫妇二人终于在1956年1月顺利回到祖国，实践科学报国志。

回国后，陈茹玉继续任教南开大学。在杨石先教授的带领下，她根据国家需要确定自己的

研究方向，积极开展当时国内急需的有机农药研究工作，同时给学生讲授“有机磷化学”“有机农药化学”等课程。不久，陈茹玉便和同事一起自主研制出一批农药产品，并在校内建成了生产车间，这在我国农药试制、生产领域尚属首创，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缓解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农药的局面。

经过陈茹玉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先后合成出对人畜危害不大、却可有效防治虫害的诸多农药新品种，如我国第一个自主创制的农药新品种“除草剂一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世纪60年代，成功研制防治小麦锈病的“灭锈一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70年研制成功新型除草剂“燕麦敌2号”和生长调节剂“矮壮素”，其中“燕麦敌2号”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陈茹玉通过先计算后合成的方式获得的胶草磷顺利通过国家鉴定，1988年这一成果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此基础上，陈茹玉的研究之路更加广阔，开启了新型替代农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之路。在有机磷化学方面，陈茹玉带领团队丰富了有机磷化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断积极探索，使其研究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1980年，陈茹玉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2009年获得建国60周年中国农药工业突出贡献奖，她的人生在科研工作中得到沉淀与升华。陈茹玉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座右铭：“能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全部力量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阅读提示·

■ 王向贤

在当代中国生育率低迷、照顾危机和母职较重等各种因素的促动下，父职研究已成为事关国家人口安全且涉及广大人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新兴研究议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年研究》近日联合召开了主题为“经世致用与中西古今”的父职专题学术会议。专家学者围绕中华传统社会中的父职、从现代至当代的父职转型、当下中国具体实际中的父职、国外的父职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父职转型与新型父职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中华传统社会中的父职、从现代至当代的父职转型、当下中国具体实际中的父职、国外的父职研究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在传统父职中，在中国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儒家父职最受关注。山东大学教授王向贤讨论了先秦儒家父慈的涵义及其在育儿的家国分担和亲亲重构等方面对于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孙尚诚通过分析儒家和基督教两种文化传统关于父职的伦理元话语和叙事逻辑，提出应返溯和汲取传统伦理中的有益元素并加以理性融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菊华认为两位专家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中西古今”的会议宗旨。山东大学副教授郭萍指出两位专家对父职的聚焦，抓住了伦理的核心问题和当今中国进行伦理重建过程的关键环节。

浙江科技学院讲师罗惠龄、东南大学博士生赵紫燕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申光明分别讨论了儒家经典《周易》对于父职现代化的意义、儒家父职的道德属性和家国象征及其时代价值。在儒家父职的历史实践方面，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陶良琴考察徽州民间的儒家父亲角色，海南师范大学的蔡敬坤探析了明代仕宦的课子及儒家父教。苏州大学教授铁爱花、中山大学副教授王堃、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徐珺玉和中国社科院副教授杭苏红希望年轻学者们能够更加深入地将其文本置于历史场景、对研究议题进一步深化细化。

综合观之，参会者们认为从现代至当代，中国父职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儒家父职转向现代父职。山东大学博士生司艺

旋以鲁迅为例，探究现代父职从长者本位到幼者本位的转向。第二次转型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启的社会主义父职。山西师范大学的张雪娇和王小平教授勾勒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父职实践、变迁特征及其内在机制。第三次父职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大学副教授王昕等发现1980年代以来的主流育儿杂志出现了父亲育儿主体位置的变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金一虹、华东师范大学讲师王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少鹏建议将分析置于更加全面纵深的历史场域之中，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父职建构历程予以细分。

父职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情形深受瞩目，多位发言人聚焦于此。在父职的基本概貌方面，四川大学研究员马继和全国妇联副研究员马冬玲考察了性别意识、时间约束与相对经济资源三个因素对父亲参与孩子的“教”和“养”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王凯丽和朱晓文教授等人发现父母育儿分工模式会影响青少年的多项非认知能力，父母协作型分工模式下的孩子在抗逆力和共情等方面更具优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郑丹丹和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刘汶蓉肯定发言人将父亲参与细分为教和养是定量研究的创新。

在何谓新型父职方面，上海大学博士生刘易阳和张敬福教授、浙江财经大学讲师李卓、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剑锋、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毛雅捷和山东大学的王鹿萍分别讨论了当代全职父亲文化合法性的主要机制、新型父亲的认知与实践，促使父职转型的文化和政策因素，“不完全利他”主义的资源机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和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提出发言人今后可结合实证资料，予以更深化细化的研究。

在新型父职的维度方面，江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苗国和南京大学博士生王亮均侧重情感，讨论了家庭情感中心的转移和亲密父职参与儿童照护的新图景。重庆交通大学讲师阳诚和中南大学的郝晓宇分别讨论了社交媒体中的精英奶爸和抖音短视频中的父亲博主。山东大学的王润雨讨论了相对资源和时间约束对于父职参与的影响。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石金群和《中国青年研究》副研究员汪永涛建议发言人深入分析父职建构在虚拟和现实空间之间的勾连，进一步打磨变量选择和统计分析。

在多元群体的父职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吴元、华东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谢阳徽和陕西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罗阳、吉林大

焦点透视

父职研究：经世致用 中西古今

学博士生周佳琳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杜金婧探讨了城市中产阶层男性的“协商式育儿分工”等父职实践模式。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高修娟、北京外国语大学助理教授覃云云、外交学院老师施慧、山东大学的付鹏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卜娜娜分别讨论了流动父职、寒门贵子的父职、单亲父职、残障儿童家庭的父职和老漂父亲的祖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魏伟、山东大学教授李淼、南开大学副教授杜平、北京科技大学讲师郭戈肯定作者们对于多元群体的呈现，并期望今后能够进一步挖掘各个群体的父职特异性。

在父职的挑战和应对方面，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陈雯和四川省社科院的赵悦彤讨论了父职排斥对于家庭系统的新挑战 and 对于婚恋困境的推动作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洁和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期望今后的父职在研究和实务上更为扎实和更有成效。

针对国外的父职研究，北海道大学助理教授孙诗咏、纽约州立大学博士生杜世超和上海大学的刘一艺分别探讨了日本父职变革的成果与挑战、21世纪以来英语学界的缺席父职研究、中西交融背景下父子关系内涵的转变。北京大学教授佟新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春华赞赏作者们研究方法的丰富多元，希望对于国外研究的梳理能更契合于中国需求。

父职研究的成果与未来

多位与会者肯定了会议的重要意义。杨菊华教授指出，本次会议是全国第一次聚焦于父职的大规模会议，将会开启今后相关研究的先河。上海大学计迎春教授认为父职研究群体正在生长和扩展。《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主编石彤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主编陈业强认为会议成功地促进了多学科交流和老中青三代的联手研讨。中国妇女报社编委会委员、《新女学》周刊主编蔡双喜期待专家们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中西古今四个维度推进父职研究，结出更丰硕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成果。

本次会议的突出成果是将父职这个人类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从日用而不觉的隐形状态，推至学术研究的可见光之下，并通过对儒家父职的开拓性研究，对于清末直至当下中国父职的多主题跨学科研究，从父职角度增进和加深了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解。其实，在清末以来的中国父职现代转向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父职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在未来的父职研究中，期待研究者们以二十大强调的“两个结合”为指导，不断推进新时代的父职研究，努力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人口可持续发展 and 性别平等事业，从父职方面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